

【论 文】

社会时空变迁中的当代民族关系发展问题

常 宝*

一、西方与中国社会研究和理解中的“时空”概念

“时空”概念的研究，最早起源于自然主义和自然科学领域。“时空特性在自然科学中的重要意义突出地表现在 20 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中，从牛顿力学的时空观向相对论时空观的转变，也就是从经典物理学到现代物理学的转变。时间与空间，在牛顿力学中只是物体运动的外部条件，它们本身是不变的尺度。”¹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时空”概念的出现及其运用，对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开辟了新的领域。例如在哲学领域，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性构成了存在的根本意义。

19 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全范围影响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在自然科学的典范作用下大量引用和借鉴了自然科学的时空视角。涂尔干主张把社会事实当作“物”来研究，试图将社会现象置于时空中，使社会现象和行为具有时空属性。但由于社会现象、社会行为和社会过程的复杂性、易变性特点，自然科学的时空概念很难准确捕捉和测量社会现象与行为的位置及其意义，很多人开始有意忽视并反对社会的时空性研究。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融合中，尤其是时空概念的采用和阐释中，社会科学遇到了是否把自然科学的时空概念原封不动地引入社会科学，社会是否具有独立的社会空间和社会时间特性的问题。对此，很多社会学家反对使用自然科学的“日历”来度量和测算社会变迁、社会过程的作法，力图发明社会独立的时间、空间特性，做了很多探索。涂尔干试图给一直被人们视作意识、主观性领域的宗教领域赋予社会属性和时空特性，认为神秘的宗教理念和仪式具有显著的社会性和时空感。涂尔干认为：“与原始社会组织相似，空间、时间和其它思维类型，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²

关于时空在社会学中的研究，并未得到很多人的关注和持续地发酵，在社会研究领域一直处于冷门、一种很少触及的角落和工具箱。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大多数社会分析学者仅仅将时间和空间看作是行动的环境，并不假思索地接受视时间为一种可以测量的钟表时间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只不过是现代西方文化特有的产物。除了近来一些地理学家的著作之外（……），社会科学家一直未能围绕社会系统在时空延伸方面的构成方式来建构他们的社会思想。”³ 随着 20 世纪后半叶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人们再一次把目光放在社会的时空研究。吉登斯认为：“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⁴ 他的理论用“时空延伸”概念将自然的时空和社会时空连接在一起，在社会领域发现和解释了自然的时空。

西方和中国虽然处于同一个地球的自然与社会时空中，但以西方社会与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时空感和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与中国有所不同。

* 常宝，男，蒙古族。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艺术社会学；民族社会工作。

¹ 景天魁，“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中国社会学会网，2012 年 2 月 14 日。

² [美]科瑟著，《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58 页。

³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95 页。

⁴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96 页。



从古至今,中国有其独有的社会时空概念及其理解法。中国古代就有“宇宙”一词,其中“宇”指的是空间,“宙”指的是时间。从中国古典文学中看到:“《墨子》、《淮南子》中的某些叙述意味当时的时空概念至少已具有初级程度的‘空白’,《墨子·经上》中‘久’‘宇’的概念是作为遍及的不同时间及位置分别给出的。”¹ 在中国的古代经典文献中,充满了将时空有机地糅合在一起的文字描述。除了像《庄子》这种哲学典籍外,诗词曲赋等文学作品中也随处可见。如:用时间的跨度来描述空间的“秦时明月汉时关”²,用空间的跨度来描述离别时的时间“孤帆远影碧空尽”³。

二、当代中国社会时空变迁的几种类型及其陈述

近代以来,尤其进入当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演变和转型,在时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迁,融合与分裂、整合与解体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时空演变的主题,至少出现了以下几种时空演变的概念及行动体系。

1. “传统性”与“现代性”

在世界“总体历史”(米歇尔·福柯)上,人们将1500年作为时代的水分岭,一直被追溯为现代的源头。“1500年前后发生的三件大事,即‘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则构成了现代与中世纪之间的时代分水岭。”⁴ 现代化与现代性最早发端于西欧。在欧洲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宗教意识的世俗化以及科学的发展等内部条件和通过对殖民地掠夺、对外扩张等手段获得的资源与市场的控制为核心的外部条件对现代化的形成和扩散奠定了基础。吉登斯粗略地将现代性定义为“17世纪以来出现在欧洲的那种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并且以欧洲为源地,自那时以来不断地向全世界蔓延”。

中国的现代化是属于移植性的社会发展形态,即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并非完全始自中国社会本体,而是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密不可分。从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发展整体情况来看,经过早期以民族运动为主要动力的低度现代化时期、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和后来的改革时期,在漫长而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上逐步形成并实现现代化的。随着道德与法律、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分裂、拒斥、张力和冲突,现代性日趋凸显,传统性与现代性越发泾渭分明。

2. “乡村”与“城市”

自古以来,乡村与城市是中国社会的重要时空概念,成为二元社会的根源。在历史上,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体制社会,即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各为一元的城乡差距和分割一直延续的社会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渐次进入快车道,城乡结构日益呈现为两个看似矛盾,但又与社会发展具有内在关联的特征,即城乡差距愈发显著和城乡分割开始弹性化。随着工业化体制的引入,工业化道路的惯性发展是造成城乡差距愈发显著的又一重要原因。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并不仅仅意味着城市对大量的乡村劳动力和人口的吸引,也意味着乡村农业和农民自身的转变。也就是说,留在农村或城乡之间不断摇摆、穿梭的农民,通过对乡村农业的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并以产业化的乡村农业与整个工业化的经济融为一体。乡村与城市主体在当代中国发生了变化,成为既相互矛盾,又彼此融合的时空。

3. “中央”和“边缘”

¹ 张会翼,“中国传统思想中时空概念的比较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3年,第3期。

² 《唐·王昌龄·出塞》。

³ 《唐·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⁴ [德]哈贝马斯, J.,《现代的时代意识及其自我确证的要求》,载《学术思想评论》第二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长期是一个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古代，以中原为代表的国家统治理念中有明确的中央与边缘的区分，各个朝代以不同形式和手段对地方实施了聚合与笼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是社会变迁与体制改革中的中轴。

中央与地方关系始终处于分分合合、融合与隔绝的状态。近代以来，尤其在当代工业化、现代化和市场化改革下，中央与地方关系出现显著的分裂和分解趋势，中央与地方关系亟需相应的调整 and 安排。“全球化为地方自治和新型地方主义创造了需求，地方身份认同开始变得备受关注……中央分权对于全球时代的治理变得极为重要。治理不再是对地方的集权，而是必须允许地区自治。”¹ 在工业化与市场化条件下，在不同群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中中央与地方分别代表着不同利益，中央的统合性能力不断下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竞争不断升级，在这一场持久的斗争中很多地方有可能成为新的“边缘”。

4. “延续”与“断裂”

“延续”与“断裂”也是当代社会时空变迁中的重要特点和一种结果，用福柯的话来说：“不连续性的概念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著位置。”² 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相互影响、互动和演变过程中，不仅有传统的继承和历史的延续，也有剧烈的断裂和分散、解构，“断裂”成为描述当代社会的新概念。

中国社会正处于现代性背景下的“断裂”的中心，以收入差距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两极分化会固化为一种社会结构、城乡之间的空间断裂，在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的出现和分裂充实和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断裂”过程。因此，“延续”与“断裂”又构成了另一种特殊时空。

三、多民族国家社会时空的变迁及其特征

在古代中国，以中原为核心，由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时空观——“天下观”、“畿服”概念早已形成，成为古代统治者、文人的世界秩序观和时空观的重要内容，最终形成了“中国”和“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为“天下”，中心和边缘相互融合，中原与周围各民族、部族和族群同居“四海”的整体格局。

费孝通在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从时空视角分析和论证了中国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过程，描绘出了一副完整的民族关系发展史的图景。进入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社会不仅被卷入中国社会现代总体性发展，即进一步凸显和加强“一体化”进程的同时，在微观层面上也进一步失散和浑浊，其中的变异、抗拒、批判、摒弃和排斥依然存在并日趋复杂化、多元化。当代多民族国家社会时空变迁呈现出以下几种特征：

1. 时间的同一性

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对未来的开放性，就是说，它的时间之矢是射向未来的、要求同一性的、标准化的。自古以来，中国境内的多民族对自然、时间与空间有独特的认识和理解方法。例如：每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或三十日是壮族新年，传统壮族村寨家家户户杀猪宰羊，合家祭祖，联寨拜社，喜迎新年。如今，过传统壮族新年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多人习惯于过中国汉族的新年。哈萨克族牧民们不再通过传统的骑马方式聚集到一起，而是在“阿吾勒”（村子）和乡镇的统一安排下，有组织有计划地举行节庆活动，节日时间缩短了，内容也不断被改写了。很多蒙古人离开或放弃了传统游牧生活，开始种地，开始向城市移动。蒙古族节日民俗及社会时间不断向汉族或西方民族习俗靠拢或被取代，淡忘传统已成为常态（如下表）：

¹ [英]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郭忠华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10页。

² [法] 米歇尔·福柯著，《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9页。

传统		当代	
蒙古族	汉族	蒙古族	汉族
祭敖包、骑马节、那达慕、成吉思汗祭奠、兴畜节、除夕、白节、初一、初二、初七、正月十三、十五、十六	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小年、二月二、四月八、六月六、腊八	春节、元宵节、情人节、清明节、母亲节、儿童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圣诞节、元旦	

2. 空间的一体化

古代，中国各民族对空间有自身的理解和解释法，如下图中的“东”与“西”的空间概念在不同民族的传统中有不同的表现。“东”与“西”在纳西文和象形文中的参照物是“水田”，

	东	西
汉字	东	西
甲骨文		
金文		
纳西象形文	 nimen-tu	 nimen-gun
彝文	 bu-du	 bu-ji

而在彝族文字中以“山”和“井”作为参照对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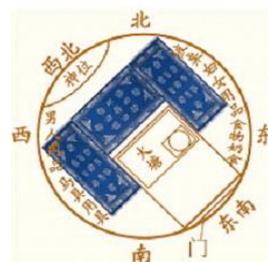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与北方各民族之间的边界和阻隔中“长城”始终扮演重要角色，一直到清朝后期“长城”依然是中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社会文化之间的空间界限。

人是文化的载体，人口流动是最能体现社会空间感的指标和实践。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劳动力日益市场化、国际化，城乡之间人口流动速度加快，无论是高层精英和底层的农牧民，“背井离乡”成为是社会人口的显著特征。在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向城镇和汉族地区流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种族人口形成弥散性分布格局。

3. 传统时空的“迷失” (Lost)

现代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对传统的断裂性，传统在时空中的“迷失”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

时空的同一性和一体化的直接结果是传统时空的“迷失”。随着城市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民族民间文化时空面临迷失，甚至出现蒸发、消亡的危机。例如，从时空角度分析，传统蒙古包的时空有其稳定性与严格的秩序化（男西、女东，神在里，火在中）特征。城市化以后的蒙古人居所里的传统时空秩序完全被打乱、迷失，只能看到传统从历史中被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



四、当代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时空表现

不同社会、不同阶层和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历史的时间性产物，也是空间性创造物。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中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¹

1. 乡村时空的资源性属性与民族关系

乡村时空，在传统上是属于审美与文化的一种存在。时间的懒散和自由、空间的辽阔与恬静是传统乡村的重要特点。在农业与游牧经济行为作用下乡村时空始终处于稳定、可利用和控制的

¹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范围。进入工业化时代，尤其引入市场经济模式之后从国家到地方、从政府到民众，对乡村时空的认知和使用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往日的安宁而祥和的乡村时空瞬间被市场经济的躁动和不安所打破。传统乡村社会，一般是地域性、内向的、固守自己的，而现代社会具有世界性、外向的和开放的特征。

在工业化、市场经济面前乡村社会时空骤然成为利益交换、资源开发的领域，乡村的土地和资源成为人们激烈争夺（土地法的细则调整；宅基地概念的出现）的对象。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情况看，幅员辽阔、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自然科学新技术的发展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之间形成良性机制，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开发（土地法与草原法之间的衔接问题；土地法是否适用草原地区的争论）涉及到国家与地方、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不同民族人口劳动力关系，甚至拨动了当地民族的文化与认同的敏感神经，出现了不利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关系和谐相处的问题，增加了社会成本。因此，乡村地区时空的资源性属性及其被市场化、利益化过程使得当地民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演变，时空的变迁打造了新型民族关系模式。例如：新疆地区干旱、光热丰富、降水稀少等时空条件创造了丰富的棉花、瓜果和天然气等独特、珍贵的自然资源，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成为国家和地方争夺的领域，从而也刺激和觉醒了地域、民族认同，民族关系出现了新的转向。

2. 城市时空的社会隔离与民族关系

时空的分异、隔离是城市的基本特征。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城乡之间原有的时空格局，社会生活和居住模式发生了变化。近几十年来，就如大量的农民工人口涌进城市一样，少数民族人口也通过各种途径涌入城市，具有不同经济、地位、文化背景和心理特征的不同民族群体在各种原因驱动下选择聚居，改变了过去以业缘、地缘和族缘为主的居住模式。虽然在城市居住隔离状态下，从空间上限制了不同民族人群的社会交往，但在日常生活、生产过程中，不同民族人口相互接触和交往的概率比起以往大大提高，并在隔阂和排斥的城市环境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群体交往模式。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蒙古族人口大约占10%，汉族人口在相对数量上远胜于蒙古族，汉语成为蒙汉民族之间的族际语言。在居住格局上，呼和浩特市蒙汉族人口杂居，缩短了两族接触的距离，使族际互动处于全面、充分、活跃的状态。文化上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大，使得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民族偏见缩小，民族关系融洽。据说，20世纪90年代，在呼和浩特市某住宅小区，由于土地开发商是一位蒙古人，他想打造纯蒙古族人居住的住宅小区，采取优先、优惠出售等办法鼓励蒙古族居民到该小区居住，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打造纯蒙古族人居住的住宅小区的目标未能实现。又以新疆乌鲁木齐为例，全市常住人口为311.3万人（2010年11月）。汉族人口约233.2万人，占总人口的74.91%，各少数民族人口78.1万人，占总人口的25.09%。乌鲁木齐市位于河谷地带。南临天山山脚，北面是沙漠。因此呈现出南北走向的发展。地势上南高北低。在民族人口居住格局上也形成了“南维北汉”格局。

同样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呼和浩特与乌鲁木齐在不同民族人口在时空中的分布及民族关系类型、性质存在很大差别，这样的表现有可能起源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历史事实、文化、宗教背景直射当代社会的结果，也有可能起源于当代社会时空所捕捉到的不同民族成员所获得的机遇、信息、利益诉求和实践过程。

五、民族关系在当代社会时空中的意义系统建构

社会是由不同阶层、群体和民族关系构成的形式与事实，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建立各种个体与群体关系，以特定的方式来分配权力和资源。这种方式既是地方性、民族性、特定性的，也是



普遍性、全球性的。围绕社会时空变迁中的个人、群体、国家，关注它们内外关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即在市场化、理性化、现代性的背景下凸现出以下几种特点，已构成独特的意义系统：

1. 社会矛盾的扩散性增加

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看来：“通讯造成依赖程度提高和全球化的动力。”¹ 在当代，互联网已经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对于社会矛盾的揭露和监督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在社会运行过程中，互联网承载着社会“安全阀”的功能，已成为民众的情绪宣泄通道，对社会矛盾监督和外漏性、扩散性增加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城市地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城市时空的隔离性特点促使了人们对互联网的开放性、多样性和虚拟公共空间的依赖与需求的形成。

在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问题上，无论是在边远的村落还是超级大都市，不同民族个体和群体性事件都很快被传播并迅速成为众说纷纭的事情，甚至不同民族个体之间的日常冲突也会转眼间演变为不同民族众多民众和精英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甚至演变成具有全国性或世界性影响力的事件。

2. 社会问题政治性的增加

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政治性是人类的属性，政治是保护自己、维持自身的策略。“广义上讲，凡涉及资源和权利的分配都可以被看作政治。”² 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很多人认为政府不断从社会经济领域退出，与过去相比，民众的工作、收入和生活的很多方面不再与政府、权力和政治紧密挂钩，社会上的经济矛盾正在变得地方化和非政治化。但在民族地区和城市社区，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相反的现象：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矛盾在内的各类社会矛盾的政治性不断增加，丝毫看不到“去政治化”的倾向。从风险社会角度分析，在当代风险社会“那些迄今为止还被认为是非政治性的东西，变得具有政治性——在工业化过程自身中对起因的消除。”³

在中国“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社会关系与居住格局中“社区”单元十分重要，因为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民族人口依然是以“社区”为单位（“小聚居”）的群体。因此，“从社区工作的定义来看，社区工作的范围也是与政治有密切联系的。比较社会工作的其他范畴，社区工作可以说是较为政治化的。”⁴

3. 精英反思性的增加

一个国家转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新的矛盾和问题多发的过程，具体反映到民族问题的复杂化与民族意识的暂时强化。由于贫富差距、社会不平等与不公正现象的出现，国家与民族认同呈现出分裂局势，国家认同的建构越发举步维艰，地方主义、族群民族主义一时蔓延、扩散。“随着近年来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方面开始实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中央政府的行政控制力量在减弱，而地方政府的政治和经济自治权力得到加强，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差距越来越大，原有的意识形态控制也在不断弱化，这就使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在政治上、经济上具有了一定的土壤和发展条件，也使得有些族群中的部分人提出了建立‘民族-国家’

（nation-state）的分裂主义要求。”⁵ 正是这样的局势，诱发和引起了许多地方与民族精英反思性观点。其中，一般包括以下两种：

（1）时间的历史与文化主义

¹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郭忠华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页。

² 甘炳光、梁祖彬等编，《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19页。

³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⁴ 甘炳光、梁祖彬等编，《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19页。

⁵ 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页。



历史与文化是民族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视角和方式。通过历史与文化的理解、解释和描述，可以深层分析和了解民族群体和个体心理，进而深刻研究社会文化冲突、隔阂和距离。一直以来，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中，尤其在少数民族精英的观点和学者的研究中始终存在两种倾向：即“祖先的追思”与“文化的复活”。具体而言，很多民族精英不断追溯和发现祖先的伟大业绩和历史功勋，夸大和凸现本民族文化特点与内容，强调自身文化的神圣性与优越性，以实现个人和集体、群体利益目的。福柯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认为：“在最初的某种表述和在数年或数个世纪后或多或少准确地重复了这种表达的句子之间，考古学描述不建立任何的价值等级；……它只是试图建立陈述的规律性。”¹

（2）空间的环保主义

土地是“民族主义”的核心筹码，也是其奋斗的目标。民族地区所拥有的原始自然资源（矿物、植物和其他资源）常常出现在“民族主义”诉求中，是“民族主义”这座摩天大厦的“地盘”。在前苏联时期，阿塞拜疆地方“环保主义”倾向十分突出，尤其在爱沙尼亚，“环保主义”与“族群民族主义”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在民族精英群体的诸多反思中，历史主义的“空间丧失感”始终存在，例如在当代蒙古族精英们的反思中，以近代内地汉民的涌入、“长城”边界的消失、当代工业化作用下的草场萎缩等内容为主题的反思不断被描写和强调。

环境危机及其保护意识是当代社会的产物，在古代人口稀少、自然环境相对完整而未被破坏时期，人们不可能有环境危机感和保护理念。民族主义、环保主义等思想观念的崛起是与当代风险社会意识相关联的，因为风险社会是指一种社会、文化、群体与自然多重的灾难性社会。在灾害和风险面前，民族精英群体首先反思和认识到“在科学的‘摆脱贫困的方程式’中，固有一种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意义。”²

参考文献：

- [1][美]科瑟著，《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 [2][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年。
- [3][英]安东尼·吉登斯著，《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郭忠华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 [4][法]米歇尔·福柯著，《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
- [5][德]乌尔里希·贝克著，《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
- [6]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 [7]甘炳光、梁祖彬等编，《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

¹ [法]米歇尔·福柯著，《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83-184页。

²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